

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蒋介石的反应

1971年10月25号的深夜，联大第1976次会议做出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认她的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彼时，纽约街头车水马龙，联合国大厦里掌声雷动。而以周书楷为首的台湾当局外事工作人员却泪洒街头，离开了这个伤心地。

蒋介石的心理准备

1971年11月2日22时，周书楷一行飞抵台北。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前来接机的蒋经国并没有对他们予以责备，反而是对其好生安慰了一番。而差不多一个月后，“代表团”成员向蒋介石亲自汇报时，更是惊讶地发现蒋介石看上去态度平静，甚至声称自己“已预做退会的心理准备”。

蒋介石真的看开了？其实不然。周书楷这些人并不知道，当中国重返联合国的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的时候，正在花园散步的蒋介石泪流满面，连为自己戴上帽子这样简单的动作都无法完成，直接将帽子掉到了地上。

不过要说蒋介石对此没有丝毫准备，倒也未必。实际上在1951年，台当局在联合国的工作人员蒋廷黻就已请示过蒋介石，若是大陆乘朝鲜战争之威重返联合国，那么他们究竟应持怎样的态度。蒋介石毫不犹豫，立刻作出了抉择：“我们复国基础有二——在国际上，法律地位的凭借，则为联合国；在内政上，则为复兴的基地台湾。这两个基础，皆甚重要，但其根本，还是在台湾。如两者不可得兼，则我宁可放弃联合国，而确保台湾。”

这是我政府到了最后不得已时的唯一政策。”

对蒋介石来说，联合国作为二战后国际社会的重要舞台，是他博取外国承认的重要战场，当然马虎不得。但台湾地方虽小，却是地球上最后一块能够承载其权力的实体所在。因此他一口咬定，台湾才是他后半生最重要的东西，为此他甚至可以放弃自己在联合国的一切。所以在万不得已之时，放弃台湾在联合国里的代表权，他是有一点心理准备的。

徒劳的努力

时间回到几个月前的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未提前通知台湾当局的情况下突然发表全国讲话，表示“我已派我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博士，在其最近的世界之旅中前往北京”，同时尼克松表示，他将“在适当的时间访问中国”。

这个消息宛若一颗原子弹，在蒋介石的头上炸开了。据说蒋介石闻讯后当场失态，破口大骂尼克松。台湾媒体也一反常态，称尼克松“险不可测、原无信义可言”“自贬身价、降格以迎”。而就在尼克松发表全国讲话的当天，阿尔巴尼亚等23个国家联袂而至，向第26届联大提交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政府代表”的提案。

惊慌失措的台湾当局外事工作人员依然在做着徒劳的努力，台驻美负责人沈剑虹不厌其烦地与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确认着尼克松的下一步计划，但是罗杰斯压根就不知道尼克松的下一步计划到底是什么。基辛格出访中国的整个行程都是高度保密的，而尼克松几乎没有对罗杰斯透露任何多余的信息。

7月18日，美国国务院在备忘录中表示“原本机会很小的双重代表案及任何形式之重要问题案”，由于基辛格访华消息所带来的冲击“机会在减小”。而尼克松却在此时丢给了国务院一个最为棘手的工作：在8月初之前，搞定今年联大的“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细节。

尼克松敢于放手让罗杰斯他们去搞，是因为基辛格在北京试探过中国人的底线。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他，中国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案”。因此只要美国能让“双重代表案”进入联大表决环节，那么实际上就已经取得了胜利。因为无论有多少张赞同票，中国都不可能接受以这样的方式重返联合国。但是由于缺乏对细节的了解，罗杰斯等人却将问题复杂化了，他们认为既然中美关系已经发生了如此之大的变化，那么必须要对现有的“双重代表案”决策进行彻底地修改。而很显然，单单只是将新中国迎回联合国已经不够看了，必须把安理会的席位一并送给他们，才能把台湾当局留在联合国里。

很快，压力便从美国人身上传递到了蒋介石身上。7月1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见了沈剑虹，指出“如用双重代表案而不与中共安理会席次，而仍由台湾保持之，亦难获通过”，因此他希望台湾审时度势，好自为之。23日，美国驻台负责人马康卫面见蒋经国，不断劝诱其放弃安理会席位。

最后的日子

8月2日，美国正式声明，表示支持“双重代表案”。两天以后，新华社对美国的行径进行了批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9日，周恩来公开表示：

“如果两个中国的局势在联合国内出现的话，中共将断然不会接受联合国之席位。”

由于在联署“双重代表案”过程中，许多国家都对美国没有明确指出安理会席位到底要给谁发问，因此不堪其扰的尼克松，竟然在9月1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态：“我们允许且将投票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这也表示会给他们安理会的席位。”一石激起千层浪。原本还在紧张激烈地策划着联署“双重代表案”的美国和台湾当局之间，忽然多了一道看不见的鸿沟，双方彼此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10月5日，基辛格再度出访中国的消息让分歧重重的美“台”双方再度陷入互相攻讦的状况之中，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台湾当局在联合国里的日子，只剩下最后几天了。

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台湾当局的外事工作人员从来都是谨小慎微行事。因为怕英美友人听不懂自己的语言，所以台湾当局历任派驻联合国的代表基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为荣。1950年，伍修权率团参加联大会议时曾辛辣地讽刺过国民党的工作人员，说：“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20多年的卑躬屈膝，依然迎来了末日的丧钟。在最后的日子里，台湾当局的外事工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每日穿梭于联合国总部大厦的各个房间之中，一遍遍地估算着票数。但由于提案时间太晚，美、日、蒋三方对外宣传口径不一，加上尼克松访华消息带来的冲击，这些人所做的努力，最终全都化为乌有。

据《国家人文历史》刘志斌/文

袁枚中暑险丢命

乾隆四十一年(1756年)九月，那一年的秋天南京特别热。一天，正在南京随园居住的文学家袁枚突然感觉身体不舒服，家人连忙请来了一个吕姓医生。经过诊治，袁枚喝下了吕医生的中药。早上喝的，结果到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突然呕吐不止，头晕目眩。袁枚的母亲抱着他，让他坐在床上。这时，他感觉到一股血气往上涌，十分难受，大有性命难保之势。一家人急得团团转，也没啥办法，难道

眼睁睁看着他死掉吗？

恰好，与袁枚一同参加乡试的好友赵黎村来访，家人就把袁枚的病情告诉了他。赵黎村说：“我懂得一些医道，让我来看看吧。”家人没别的法子，只好把赵黎村领进了袁枚的卧室。赵黎村给袁枚把了脉，观察了病情，微微一笑说：“这是中暑了，我能治得了。”赵黎村写了一个方子让人速去买药，并买些石膏粉来。

很快药熬好了，加上一些石膏粉搅匀。一勺下肚，袁枚顿觉犹如千钧

之石，将肠胃压下，血气不再上涌。半碗喝下去，就已经沉沉地睡去了，不久额头上出了汗。朦胧中，听到母亲在他跟前念叨：“难道是吃了仙丹吗，这么快就见效了。”后来，袁枚醒了，看见赵黎村还坐在他的床前。赵黎村问他：“想不想吃西瓜？”袁枚说：“想吃了。”立即又让人去买来西瓜。赵黎村说：“你使劲吃吧，我先回去休息。”袁枚放开量，大口大口吃了那个西瓜，感觉犹如醍醐灌顶，不再眩晕，眼

睛也不模糊了，晚上就想吃饭了。

第二天，赵黎村又来了，一起聊起了这个病：“你这是因中暑引起的阳明经病症，而那个吕医生误当成太阳经病症给治疗，又用了升麻、羌活二味药提升之，更使得你的妄血逆流而上，只有白虎汤（石膏粉）治得了，否则性命危险了。”

袁枚中暑，本来没多大的事却让庸医给误诊了，幸亏遇到了好友赵黎村出手相救，才保住了性命。

据《北京青年报》刘永加/文